

# 军旅旧忆

□ 李国新

我向来不大愿意写回忆性的文字，尤其是回忆个人成长的文字。这类文字大多是“好汉当年之勇”，要么就是自己的“糗事”，再有的可能就是几分沉沉暮气罢了。可是，当建军节又一次来临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回望军旅生涯，唉，终究是落了俗套。

我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，正迷茫困惑之际，听到了征兵的消息，我突然就萌生了去当兵的想法。报名、体检、政审，然后等待接兵干部家访。往年我们村当兵名额最多也就一两个，可那年符合条件的有我们三个人，我能不能当兵还很难说。后来，接兵干部在镇武装部长陪同下到我家家访，询问了我的个人和家庭情况。我父亲是农民，母亲是教师，我还有一个哥哥。他们看到挂在墙上的是我的书画作品，当即对武装部长说：“这孩子高中毕业，还有特长，我们必须接走，名额从别的地方协调。”就这样我如愿当了兵。

到了部队，新兵班班长和我们逐一谈话，他得知我高中毕业，喜欢写字画画，并且一直在学校办黑板报，显得非常高兴，说：“咱们连就缺你这样的人！你在部队可以考军校，也可以提干，要努力工作，干好每一件事。”我那时也是不知深浅，问了问班长部队考学和提干的条件，然后就说：“我上的职业高中，没学过英语，没办法考军校，我想办法提干吧。”从那时起，我就认定了提干这个目标。经历了待业的迷茫和苦恼，我意识到一个农民家的孩子要想改变命运，就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机会。

部队每逢重大节日都要组织黑板报比赛。元旦前夕，指导员因为原来的文书退伍，没有人会办黑板报而一筹莫展，班长就推荐了我。指导员亲自把参加黑板报比赛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我自己设计插图，并结合新兵连的实际撰写了文字内容，很快就把一期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办完了。我办的黑板报同时荣获了新兵营和全旅两个第一名。为此，宣传科长还专门到连队了解了我的情况。一个月

以后，指导员见我的单兵素质和体能训练已经能够达标，就把我调到了连部。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帮他编写政治教育教案。我根据授课提纲，搜集素材，拿出初稿，他再修改定稿。因为母亲是教师，我对教案并不陌生，没用几天，我就可以独立完成教案编写了。

新兵连结束，我跟着指导员回老连队当上了军械员兼文书，军械员兼文书在连队负责战斗文书编制、实力统计、军械装备管理、档案管理、机要通讯等各种工作，号称“小指导员”。新兵授衔时，同年兵授列兵军衔，而我则是授上等兵军衔，津贴也比同年兵多了五块钱。

我任军械员兼文书期间，我们连队的黑板报，在全旅比赛中始终是第一或第二名。我们连队在军械装备检查评比中始终是第一名，成了装备部免检单位。我们连队是战备值班连队，我编写的各类战斗方案在历次检查、拉动中都受到了各级首长的高度评价，称赞我是“士兵岗位、参谋水平”。我连续两年参加全旅《军队基层建设纲要》和《条令》知识竞赛。第一次参赛前，政委正在我们连队蹲点。一天早上在厕所，一个老兵问我：“文书，《纲要》和《条令》都背过来了吗？”我开玩笑说：“没问题，倒背如流。”哪承想政委也在厕所，政委说：“文书，这么有把握，那我考考你。”政委连续问了我六道难度大且生僻的题目，我全部都答对了。后来政委在大会上号召全旅官兵：“学习《纲要》和《条令》，要向九连文书那样，做到问不倒。”

当时我对这些事并没有太在意，可后来想想，恰恰是这些事，树立了我在首长和战友心目中的形象，为以后的提干奠定了基础。

有一次，副旅长带领军务参谋来核实连队实力。我外出刚回到连队，没等我去取台账，就开始了核实。军事政治实力、兵龄结构、年龄结构、学历层次、籍贯分布等各类数据我都对答如流，无一差错，

副旅长非常满意。可是军务参谋手里的名册比连队的名册多出一个人。我说：“参谋，你念一下你手里的名册，我听听多的是哪个人吧。”说着，我从指导员手里拿过笔，并从他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，边听边记，参谋读完，我立刻说：“多了某某某。某月某日该同志调出，你通知我减少了实力。”这时，参谋也回忆起来了。副旅长问我：“文书，你是不是会速记呀？”我说：“我用的是简略记法，有的人名我只写一个字就可以记住了。”从我们连队出去后，副旅长每到一单位，都要求掌握实力要向九连文书那样“一口清”。

我们是战备值班连队，有一部战备值班电话架设在宿舍。一天凌晨3点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，我翻身下床，一把抓起听筒，我还没说话，电话那头就传来：“九连！”刹那间我就听出来是副旅长的声音，立刻答道：“九连到！副旅长，请指示！”副旅长接着问：“你是谁？连长、指导员呢？”“报告副旅长，我是九连文书，连长、指导员正在宿舍休息，全部在岗。我马上来叫！”副旅长说：“不用了，我就是检查战备值班情况。你们警惕性很高，提出表扬！”第二天副旅长在全旅交接班例会上通报了检查情况，他说：“九连作为战备值班连，警惕性非常高，凌晨3点，电话振铃一声，文书就接听了电话，我说了‘九连’两字，他就听出了我是谁，这就是九连的战斗素养，各单位都要向九连学习。”

那时提干的硬性条件有五条，即：高中以上学历；兵龄满三年；中共正式党员；任战斗班班长一年以上；年龄不超过23周岁。当了两年军械员兼文书之后，经过连队批准，我担任了战斗班的班长。军械员兼文书不需要站岗，当了班晚上就得站岗了。一天深夜，我正在站岗，听着由远及近传来脚步声，我迅速警觉起来，来人快到警戒区域时，我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口令！”那人回答完口令后才走近哨位，原来是副旅长查岗。他见我，就问：“哎，文书怎么还站岗呀？”我说：“我下炮班当班长了。”

副旅长问：“哦，当班长了，那你是想提干还是想考学呀？”“我想提干。”副旅长听了很高兴：“好！文书干得不错，当班长了继续好好干，你提干我全力支持！”后来，副旅长专门到我们营、连要求营长、教导员和连长、指导员对我重点培养，全力推荐。因为有他和营连首长的培养支持，才有了我以后提干的机会。

当兵第四年年初，我参加提干考试。我当军械员兼文书时也从未放弃体能和炮手专业训练，加上上班岗位的磨练，对考试我还是比较自信的，没想到轻武器射击考试却出了问题。射击考试上午进行，射击方向正好对着太阳，第一轮刚打完，作训科长就踢了我一脚，并训斥我说：“怎么打的？不知道排除虚光吗？”我赶紧稳定情绪，调整好呼吸，认真排除虚光，打完了其余四发子弹，可是心里却非常忐忑。当天晚上公布成绩，因为轻武器射击没考好，我排名第五，而提干的名额只有四个。提干没希望了，懊恼、绝望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。我硬着头皮给副旅长打去电话，副旅长鼓励我说：“别灰心，继续好好干，今年不行还有明年呢。”刚放下电话，我的排长跑过来告诉我，排名第一的战友正式申请放弃提干机会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赶紧又给副旅长打电话，报告了这个情况。副旅长说：“好，你别管了，踏实工作吧。”后来干部科科长告诉我，旅党委征求各位旅首长的意见时，副旅长的主导意见是依次递补。就这样，我从第五名变成了第四名，被列为预提对象，经过为期一年的培训后成为了一名军官。

从我入伍到现在，过去了三十一年，我转业也已经十九个年头了。写下这些文字，既是对自己过去的审视，也是向部队和培养、奖掖我的首长们致敬！更希望那些有志于从军报国的年轻人，能够从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启发，从而坚定立志成才、报效国家的信念。

此刻，回望军旅生涯，岁月如同尘沙一层又一层地累积，掩盖了遥远的记忆，可一丝微风轻轻地拂来，那一段军旅时光立刻变得清晰、明亮起来，并且历历在目。

## 新兵连里的第一次

□ 董虎彪

人生会有很多个“第一次”。在1990年的那个春季，在泰山脚下的那座军营里，在摸爬滚打了三个月的新兵连中，我经历的那些“第一次”，至今难忘！

### 第一次领津贴

每月5号是我们部队发津贴的日子。记得当兵头一个月，津贴是19块钱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我一说，你就明白了。比如，我们班的高凌宇是个“官二代”，他用这笔津贴全部用来购买烧鸡，一共才能买4只。李双勇，是“大款兵”，我在镇里上班时，他在镇上做生意。他用这笔津贴，请我们三个要好的小老乡，在营区门口下馆子，点的是15块钱的套餐，四菜一汤，要了两瓶泰山特曲，5块钱。这就是当时19块钱的含金量。比起他们的阔绰，我是寒酸和小气的。我出身寒门，父母辛苦劳作，弟弟正在上学，攥着这19块钱，我觉得沉甸甸的。虽说当兵前，我也过惯了“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”的日子，并不知道怎样心疼父母，但到了部队上，我觉得至少应该让他们感觉到“儿子的变化”。于是，星期天，我去邮局给家里汇去10元

钱。父母在回信中说：“你出门在外，用钱的地方多，不用挂念家里头，好好干就是。”话虽这样讲，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，他们对我此举是颇感欣慰的。我记得当时买完牙膏、香皂、洗衣粉和每天差不多都要用到的稿纸、信封以后，兜里还剩下不到4块钱，1块5一盒儿的“大鸡”香烟是绝对不敢问津的，我只能抽2毛钱一盒的劣质烟。就是这样的烟，有时也接不上档，偶尔还得串串宿舍蹭两支抽。有一回，实在没辙了，我们三个老乡才凑钱买了一盒儿叫“岱岳”的烟，总算是没有断烟火……这种窘境，直到我进了机关后，才得以改善。

### 第一次紧急集合

“老兵怕号，新兵怕哨。”这话一点也不假，新兵连的紧急集合哨就像一道悬在心头的“魔咒”，搞得我们神经兮兮。“今夜，你会不会来？”便是我每晚临睡前对紧急集合提心吊胆的真实写照。

当过兵的都知道，紧急集合是对军人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反应能力的检验，也是对速度、纪律、作风、协同能力的全方位锤炼。从哨音响起，到穿好衣服，打好背包，带好装具，跑到指定地点，这一系列动作要在5分钟之内、而且是在不能开灯的摸黑儿状态下完成。于是乎，闹出了不少笑话，那种狼狽和尴尬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那是入伍后的第6天，白天训练了一整天，晚上躺下就着了。睡梦中，窗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哨音，临沂兵高凌宇个头不大，人鬼得很：“大家快起来！紧急集合！”我一骨碌爬起来，迷迷糊糊抓起床边的衣服就往脚上套，邻铺的李双勇急了：“那是我的棉袄！”黑灯瞎火的，我摸到棉裤，伸进去一条腿，却找不到另一条裤腿儿了。嘿！敢情李双勇的左腿正往我的右裤腿儿里使劲儿蹬呢。“我的裤腿儿，我的！”当兵前，我和李双勇就认识，我这一嚷嚷，大伙“噗味”一声都乐了。真是好得穿一条裤子哩！等我们穿上衣服，动作麻利的大个子鞍山兵赵卫普已经把背包打好了。“快点！快点！”排长在外面像个“催命鬼”，我一看时间来不及了，索性把被子一叠一折，用背包带儿简单捆了两道儿，抱着就跑出了门。

列队完毕，新兵连长用手电筒一照，乖乖，洛阳兵杜志奎把被子卷成了一个卷儿，夹在腋下，另一只手还在系着扣子；刘正锋的八一大裤衩竟被打进了背包，就那样霸气地在背包外侧晃动着；马庆更厉害，左脚穿的是棉鞋，右脚穿的是胶鞋。记不清是谁了，反正有的裤子穿反了，有的扣子系错

了，有的没有穿袜子，还有的只穿了一只袜子，成了“阴阳脚”，真是洋相百出啊。比这还惨的，可能要算炊事班的大李了，这家伙倔得像头驴，十几分钟过去了，他吭哧吭哧冒着大汗，嘴里念叨着“三横两竖三横两竖”，还在不服气地和背包较着劲儿呢！

点名结束，全连要在营区跑一圈儿。这下可好！惠伟跑着跑着背包散了架，只好抱着跑，结果跑着跑着，鞋带又开了，让后面的人一踩，险些摔跟头；更糟糕的是窦洪勇，他解下裤带扎在了腰上，充当武装带，只好两手拎着裤子跑，跑着跑着，偏偏背包也散了，于是，变成一手拎裤子，一手夹着背包跑；我呢，鞋子穿着大，又没系鞋带，跑着跑着，丢了一只鞋，硬是光着脚丫子跑了一大圈，解散以后，战友帮我满地找鞋子。这就是入伍后的第一次紧急集合。

后来，高凌宇每天晚上拼命喝茶水，一次次往厕所跑，借机到连部探风声，正好被连长逮个正着，罚他跑了5公里；徐敬东自己穿好裤子，抓起别人的裤子就往外面跑，王大海穿好上衣，却傻傻地找不到自己的裤子；我和李双勇勇听传言，提前打好背包，穿着衣服在硬床板上等了一整宿，天亮也没听到哨音啊……这些都成了往事如烟。当年的“事故”，成了今天的故事。“今夜，你会不会来？”的困惑和悬念，如今竟成为一种心灵的回味和期盼！

### 第一次帮厨

我们老家有句土话：“饯人守灶坑。”在新兵连，我们最喜欢干的活计，就是到炊事班帮厨。这样，就有机会多弄点好吃的，比如清炖排骨或是肥肉片子之类的。我就曾在后来的一次帮厨中，一口气偷吃过8根儿春都火腿肠儿。记得第一次去帮厨，我双手又痒着，不知道干啥啥才好。新兵班长是出东人，性格憨厚，他见我笨手笨脚，就一边用大铁锹翻炒着炒菜，一边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唠家常：“在家没干过活儿吧？”

“嗯呐！”

“我看每回吃饭，都是你指挥唱歌，嗓音不赖呀。”

“马马虎虎！”

“你别紧张，帮着洗洗菜就行！”

那时，我上进心强，干活儿从不敢偷懒。就是在凉水里洗菜，我都搞得满头大汗。兴许是班长为了犒劳我，他先让我盛出一大碗米饭，然后把猪油烧熟后，放入盐和葱花，抠出一大勺子，“滋啦”一声浇在米饭上，说：“兄弟，去吃吧！”在这碗诱人的美味面前，我的一声“谢谢”显得那么苍

## 女兵

□ 山水



当了整整10年兵，转业也已24年，竟然压根儿不知道，当年在部队我还有个“外号儿”。直到前两天，和女战友王翊在微信里聊天，她才向我揭了“密”：“每次吃完饭，你走出饭堂时，嘴里都含着漱口水，然后动静挺大地‘噗’一声，吐出来，所以，我给你起了个外号‘老噗’。那些女兵都知道！”

这顿时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。

1994年底，王翊从河南开封入伍。新兵一下连，她就分到了总机班。那时，我们和总机班一同在勤务队的食堂吃饭。一日三餐，顿顿儿都能见到女兵，这是让基层连队的战士很羡慕的事情。于是，哪个女兵长得俊，哪个女兵气质好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这些机关兵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在她们新来的那批女兵中，王翊是我们私下谈论最多的一个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王翊颜值高，身材好，尤其她常穿的那件大圆领的红毛衣，走到哪里，都像一团火苗儿在跳跃，给人一种光鲜亮丽、爽心悦目的感觉。每次进食堂，她总是按顺序排在女兵的最后一个，一副面无表情、旁若无人样子，显得十分冷傲。

她就像“谜”一样，激起了我们这些满脸青春痘儿的男兵们的好奇。那时，我和总机班的赵敏、巴蕾经常在一起搞“军营之声”广播。和王翊比起来，赵敏、巴蕾算是老兵了。赵敏是许昌人，巴蕾是郑州人。她俩性格相似，都属于活泼开朗外向型。工作之余，我们偶尔也在一起开开心心、扯扯闲篇儿。从她们嘴里，我慢慢知道了关于王翊的一些“秘密”，比如，芳龄，生日，喜欢什么样的零食，爱听什么歌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这让我一下子找到了“灵感”。

当年，到地方电台、电视台花钱点歌，作为一种新鲜事物，曾盛行一时。一些战士为了赶时髦，纷纷效仿，给部队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。我灵机一动，为何不在“军营之声”广播中也增设这样一个栏目呢？这岂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？说干就干！我们在整理原有磁带的基础上，又新购进几盒格调清新的军旅歌曲和健康向上的流行歌曲，并将所有曲目打印成册，下发到各个单位，供大家参照。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，这个栏目刚一播出，不仅马上得到了政治部首长的充分肯定，也受到了基层官兵的一致欢迎和广泛好评。《前卫报》还为此做了宣传报道。说实话，要不是因为当时闲聊提到了王翊，我还真想不出这个好点子！

巴蕾告诉我，王翊很喜欢《我和我的祖国》这首歌。也许是为了“取悦”她吧，在国庆节这一天，我特意在“点歌台”栏目中作了安排：“首长和同志们，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，应总机班几位女战士的要求，下面播送歌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以表达我们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和美好祝愿！”据说，王翊在食堂听到这首歌儿时，兴奋得连饭都忘了吃。

一来二去，和王翊慢慢熟悉了以后，我才知道，作为“美女”，早在新兵连的时候，她的戎装照就登上过军事杂志的封面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能歌善舞、能写会画，是个“才女”。曾经，我也找过她的领导刘晓燕排长，商量着让王翊平时来电影队搞搞广播，但是，显然，我的眼界窄了——因为，到总机班的时间不长，王翊就凭借自己的才华，走进了藏龙卧虎、人才济济的旅宣传队，成为一名文艺兵。这个时期，她已经提干，成了旅宣传科的新闻干事。但每逢宣传队有演出的时候，我作为“编外队员”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负责节目的串词和主持工作。虽然我和王翊的接触也算不上多，但感觉这个人蛮大气的，涵养也好。在我看来，她就像个暖水瓶，外表看似冷冰冰的，其实壶胆里头热气腾腾。她的善良、乐观、青春、阳光，深深地感染、打动着她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她和众多的女兵一起，作为一道靓丽的风景，以她们的青春活力，给这座绿色的军营增添了女性的柔情。

现在的王翊在当地供电部门工作，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。在这里，“老噗”祝她和战友们永远快乐！

